

沈君山

浮生三記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沈君山

浮生三記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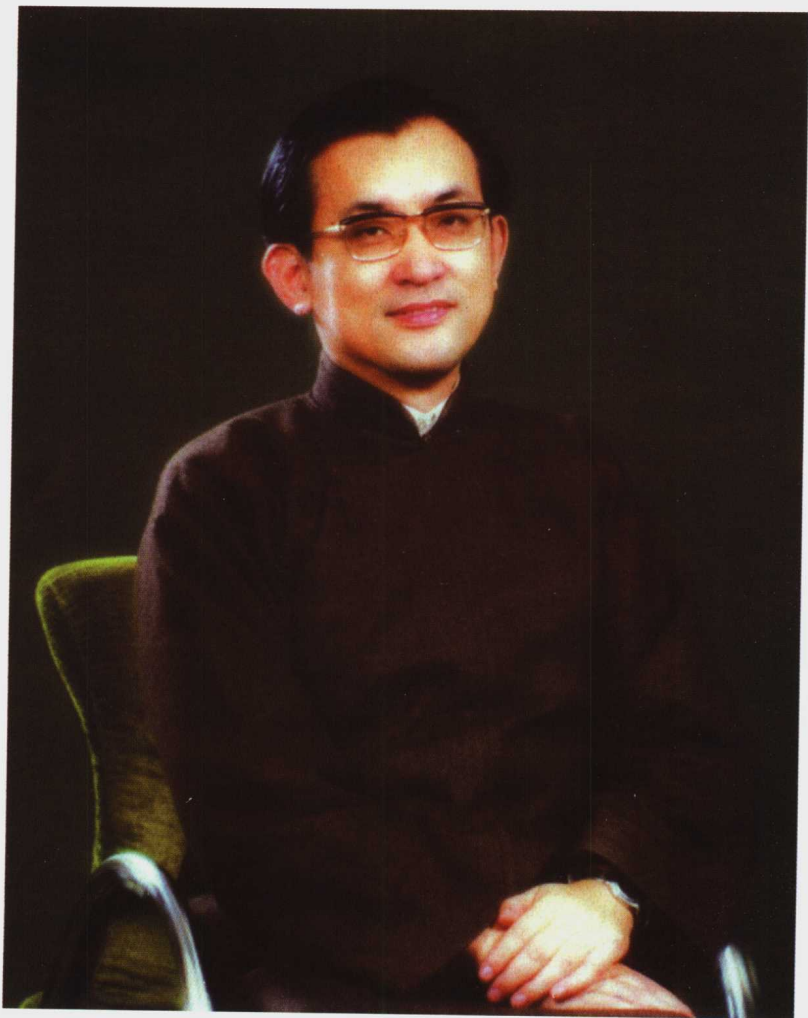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三记 / 沈君山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03. 10
ISBN 7 - 108 - 01854 - 3

I. 浮… II. 沈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8885 号

责任编辑 文 静
装帧设计 张 红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
字 数 186 千字 图字 01 - 2002 - 6719 彩插 0.5 印张
印 数 0,001 - 8,000 册
定 价 1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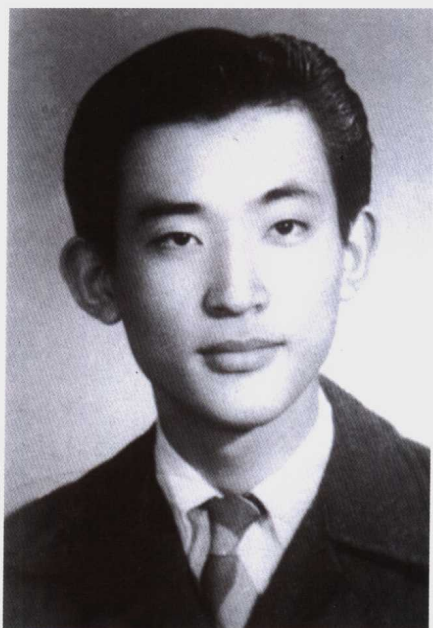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沈君山



一九八〇年秋，台北，沈君山与父亲沈宗瀚先生的最后一张合照（宗瀚先生在当年十一月去世，享年八十六岁）。



年约七岁，有点顽皮，摄于贵阳。



一九五五年台湾大学毕业时摄。



一九九六年，母亲八十大寿全家合影。



上图：一九八七年，香港，沈君山与聂卫平（左）下棋，吴淞竺（中坐者）裁判，金庸（前排右二）、陈祖德、应昌棋助阵。

下图：左起沈君山、吴清源、林海峰，合照于日本东京。



一九九九年，吴大猷先生九十大寿，清华大学设贺宴于新竹，群贤毕至，前排左起张佛千、莲实重彦（日本东京大学校长）、张忠谋、袁家骝、李政道、吴大猷、杨振宁、阎振兴（前台大校长）、陈佳洱（北京大学校长）、陈之藩、张水荣校长夫人，后排中立者沈君山（新竹清华大学校长）、左为吴家玮（香港科技大学校长），右依序为王大中（北京清华大学校长）、张水荣（韩国浦项大学校长）、李家同（静宜大学校长）、施钦泰（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）等。





一九八三年，台北，天文学会讲演前，吴大猷先生致词介绍，难得的讲了好听的话，两人都笑得很开心。



一九九五年，新竹清华与北京清华签合作交流协议，右为北京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。



一九九四年毕业典礼，率师生绕新竹清华校园一周。



二〇〇二年七十生日时摄。

王校長大中惠存

水木同源

乙亥冬與新竹清華同仁及校友
首度訪問北京清華大學留念。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

沈君山

由沈校長親筆題字，致贈北京清華大學的銅牌。

大陆版自序

本书得以在大陆出简体字版，首先要谢谢朋友们都称之为董总的三联前总经理董秀玉女士。

写序时要谢谢出版社，似乎已成了格式的一部分。但此处我的谢谢，却真是诚心诚意，尤其对董总，看了下文，读者自会明白。

《浮生三记》在台湾出版之后，几位大陆的朋友读了，认为可以在大陆出简体字版，并且说给三联最好；这是家老字号，声誉好、靠得住。我曾读过几本三联出的书，觉得这是事实，欣然同意。双方马上就签了约，预定在二〇〇二年下半年就可出版。

但是有一位好心的朋友，知道我正在准备出《浮生后记》，就给我提了个意见。写《浮生后记》原是在出《浮生三记》时就预定了的。我一生涉猎甚广，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，这两本书又是中风之后老病之余才出的，因此仿我本家前辈三白先生之例，准备分为六记：人文、科学、棋桥、两岸、爱情与老病。前四记是我进入社会后所关注的，后两记则是人生的体验。先出人文、科学、棋桥三记，老病、较政治的两岸和最难写（事实上后来也没写）的爱情则出后记。

这位朋友，看了一下《后记》初稿的大纲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但两岸一章，在大陆短期内恐怕不可能出版，因此，就建议我浓缩一下，在《浮生三记》的简体字版中加上一章。我欣然同意，就写了现在《老病与生死》的一章，这章原是病后记实，其中有一段讲我在人民解放军

总医院（即一般称之为三〇一的）养病的经过，因为所住病房与邓小平去世的病房同楼，与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巨人朝夕隔世相对，感慨颇多，其中也有涉及两岸关系的。却不料因此犯了忌讳，为了应否删改，出版一拖就是一年，而且几度濒于“不出算了”的边缘。最后，蒙许多朋友，尤其董总的帮忙，总算基本上保持原貌的出版了。

写过书的人都能体会这样一种经验，开始的时候，拟定大纲，计划进度，充满兴奋之情，随着书的进度，兴奋之情渐渐化作必须完成的责任感。到了结稿尾期，增删修改，一拖再拖，好像小孩老生不出来，作者和出版者都愈来愈不耐烦，然后，直到一天，稿终于定了，书终于出了，才可长长地舒一口气，一种解脱之感，真是舒服。

《浮生三记》之得以出简体字版，当然也有一点这种愉悦，但只是一点点，因为这毕竟只是翻印。但在出版过程中，柳暗花明花明柳暗的经过，最后终于解决，苦涩后的甜蜜，才是使我兴奋的真正原因。

为什么最后我会这样坚持呢？先说一个寓言：

当今百舸争流的世界海洋中，有三条船在奋勇前进，这三条船的乘客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，但因为历史背景不同，今天乘客的要求，颇有不同。第一条最大的船，历经战燹，受尽动乱之苦，现在船上的乘客最怕乱，最珍惜安定，其次是要能吃得饱分得公平，即所谓繁荣公正。至于在甲板上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，瞎三话四地嘟嘟嚷嚷，和选自己中意的人上舰桥指挥领导，所谓自由民主，则是最近才有的奢侈品。而且，因为积弱多年，对于自己的船，能否在争先的百舸中胜出一头，十分仰望，把能否分享这份光荣，看得很重。

第二条最小的船，一向是外国人领导驾驶，没有什么民主，但却享受惯了繁荣自由。和第一条大船一样，当然也最珍惜安定，不安定

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于当家做主民主运作也不甚在乎，但对自由却十分执著，执著在甲板上散散步看看落日、发发牢骚的自由。而且，这也是那条船数十年来繁荣的基础。

第三条船，过去一世纪的经历完全不同，一直在与另外两条船隔绝的环境下，被外来的船长管理着航行。但最近十几年，情形大为改变，完全的自己当家做主。到今天，虽然领导们，包括船长大副，在舰桥上吵吵嚷嚷，不甚成体统，但船上的乘客，似乎也习惯了，而且有的乘客所冀求已经不只是安定繁荣公正自由民主，还要自己决定挂什么旗，驶向何方，这就和第一条大船的关系，更加紧张起来。

这三条船的乘客既系出同源，当然最好能联合起来，携手共进，互惠互利。但这首先需要相互了解、沟通，过去也许有一种想法，只要领导能沟通就可以了，人多必然口杂。这话虽不错，但今天资讯发达，不管什么体制，老百姓怎么想还是最重要的。

这些都是无甚足道的陈调，只是过去一年来出版这本书的折腾，和今年七月来京时在香港所见所闻，颇产生一些感慨。总的来说，只是两点，对于我个人而言，从理性的角度写自己认识的事，说自己相信的话，是很自然的事，书可以不写，但写了必不能有一字是违心之论。这个要求，或许并不宜施之四海，前面说过，不同的体制，不同的历史背景，有不同的优先要求，但现在是在两条船之间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已经悬宕了半个世纪，而且愈来愈复杂，早已不仅是领导船长们间恩怨意气之争，总要乘客们更互相了解，才有解决的可能。假若只是稍稍提到这两船关系，便犯了禁忌，便被告知一定要提的话，只有一种说法，一种解释——尽管这种说法再合情合理，也已经提出二十余年，也到了可以因应情势与时俱进讨论的时候，否则两船之间只有愈行愈远了。这感触，使我很不舒服，也是为什么这本小书，